

『真理的追求』續集

在文化陣綫上

陳伯達 著

生活書店發行

「真理的追求」續集

# 在文化陣綫上

陳伯達著

生活書店發行

在文化陣線上  
(真實的追求續集)

每冊實價八角五分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陳伯達

發行所 生活書店

印刷所 生活印刷所

重慶：武庫街  
桂林：中南路  
香港：皇后大道  
西安：馬坊街  
長沙：昆明街  
貴陽：上海街  
吉安：金華街  
南甯：南平街  
衡陽：南鄭街  
迪化：宜昌街  
麗水：萬縣街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四月出版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五月再版

Hc0649  
2000-3500

目錄

新啓蒙運動論文續集



思想的自由與自由的思想……………一九一

思想無罪……………二八

學習批評……………三六

舊形式的利用……………四七

文化上的大聯合與新啓蒙運動的歷史特點……………五八

論抗日文化統一戰綫……………六八

論文化運動中的民族傳統……………七八

附錄：我們對於目前文化運動的意見……………七八

哲學研究……………九七

關於知行問題的研究……………九七

斷片二則……………一一八

中國思想史散稿

論五四新文化運動……………一二一

論中國啟蒙思想家——譚嗣同……………一六三

新啟蒙運動論文續集

## 思想的自由與自由的思想

——再論新啟蒙運動——



二千餘年來在專制主義的淫威下，中國人民被獨斷（教條）和迷信剝奪了思想，中國人民的物質生活過的是奴役和飢餓，而精神生活所過的，則是愚昧和盲從。數十年來中國人民在文化上的奮鬥，就是要擺脫這種愚昧和盲從的桎梏。國民革命的首領——孫中山先生，當他生前，是以很大的熱情，來幫助這樣的爭鬥的。當五四文化運動的時候，他在「與海外國民黨同志書」這樣寫道：「自北京大學學生發生五四運動以來，一般愛國青年，無不以革新思想為將來革新事業之預備，於是蓬蓬勃勃，發抒言論，國內各界，輿論一致，同倡各種新出版物，為熱心青年所舉辦者，紛紛應時而出，揚葩吐豔，各極其致，社會遂蒙絕大之影響，雖以頑劣之偽政府，猶且不敢攖其鋒。此種新文化運動，在我國今日，

誠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遂至輿論放大異彩，學潮瀰漫，全國人皆激發天良，誓死爲愛國之運動，倘能繼長增高，其將來收效之偉大且久遠者，可無疑也。」中山先生這裏是很下解了文化上發聾振聵的運動與民族振興運動的聯結的。不幸的，就是那爲中山先生所頌揚的新文化運動，因革命的中折，而再受了許多極苦痛的遭遇。不幸的，就是隨着民族危機的發展，有人正在企圖文化上的復辟。

雖則我對於許多事實的了解，和朱光潛先生所了解的並不一樣，然而我很同意朱先生在四月四日大公報星期論文上的標題：「中國思想的危機。」中國存在着思想的危機，這是事實。這種思想危機就是民族危機的一種反映。朱先生也說的很對：「思想的最大障礙是在私見武斷，而成功的要訣，則在自由研究與自由討論。」不幸的，就是在民族危機的前面，我們國內現在偏偏有關於復古，偏見，武斷，盲從，迷信，因襲——這一類的強調的提倡。更不幸的，就是有些人過去曾經是反對復古，偏見，武斷，盲從，迷信，因襲的人，現在竟然也參加了這一類的提倡，鄭孝胥的「王道」的獨斷，復古的獨斷，居然到處被

人直接間接地翻版起來了。撒謊造謠，脅肩諂笑，顛倒黑白，淆亂事非……這些會是我們民族過去最壞的德性，曾是我們過去的官僚，政客，士紳晉身的法門，現在有些公開的「文化人」，「教育家」居然公開接受了這一切的「流風餘韻」，並且變本加厲地運用起來，並且公開拿來「教育」我們的青年，「教育」我們的孩子了。理智被看成陳腐，武斷盲從被當成新奇。試想：這怎麼不是「中國思想的危機」？這怎麼不是中國文化的危機？

有些人已同感了這樣的危機，這是幸事。可是不幸的，就是有些同感了這樣危機的人，他們自己也竟然是那樣的免不了偏見和武斷。比如：蕭公權先生在施行憲政之準備（大公報五月二日星期論文），他呼籲理智，呼籲思想，這是我所很同意的。但他所譴責的中心，却不是思想上之外來的權威，却不是那種提倡復古，武斷和盲從的人，而倒是一些遭際不幸的書籍，倒是一些青年們的天真。誠然，對於這些，可加以批評，批評他們不夠深刻，批評他們還缺少修養，但却必要宣告他們在思想上無罪。他們在思想上何罪？他們要求的是要得宣洩自己的思想，他們追求着民族與人類的光明，而却受盡了荊棘。他們

在思想上的何罪？還有一位梅凱先生在國聞周報第十五期發表了「給我自由」他吶喊着：「讓我呼吸些自由空氣！給我光亮！」這是值得同情的。然而他却又罵那些追求自由和光亮的人是「毒蛇」是「飲鴆」。這又是極不可解的。在文化落後，思想多難的中國，一些不幸的文化人，殷勤辛苦，經過許多的轉折，寫些通俗的文章，打算稍來喚醒民族的靈魂，而一些精神飢渴的人們，也拿了這些東西來當文化的食糧。這是應值得有理智的人的同情，還是值得有理智的人的咒罵？難道這種咒罵，不恰是不顧事實的偏見和武斷？難道那一些通俗的文章，在千辛萬苦中還得有一部分的人讀，不正因為是適合於讀者之思想上的需求？為什麼那些讀者不去讀？為什麼那些讀者不去讀太上感應篇？為什麼那些讀者不去讀希特拉的我的奮鬥？為什麼那些讀者不去傾聽慕沙里尼的說教？難道那些讀者甯願「在深夜中，燭光搖曳中」去讀那些不幸的書籍，而不去盲從傳統和權威，這還可以稱他們是「盲從」？難道那些（應該說是許多許多）青年們在行動處所，表現着自己大無畏的天真，那不正是表現着青年們追求真理的勇敢？

反對偏見，獨斷和盲從，這絕不是說，和我意見不合，而別有主張的，就算是偏見和獨斷，也絕不是說，那些不同意我的意見，而同意別人的意見的，就算是盲從，偏見和獨斷的特點，就在於拒絕批判，拒絕新真理的發現。而盲從的特點，就在於對事物，不思想，不批判。我們了解了這種偏見，獨斷，和盲從的特點，我們才能夠真正洞澈現在中國思想的危機。否則，反對偏見和獨斷的自己，倒先陷在偏見獨斷中了。

挽救目前思想界的危機，惟一的道路就是思想的大解放。要掃清數萬萬同胞數千年來的愚昧，使他們能普遍走上救國的覺醒，惟一的道路，也就是思想的大解放。每人都應有自由思想的權利，每人都應有自由的思想。每人都應有批評的權利，每人都可以被批評。我們所提出的新啓蒙運動，其要求總括來說，就是思想的自由與自由的思想。我們不是空想主義者，我們知道思想的自由與自由的思想之完全可能的歷史遠景，然而我們却必要了解這二者的提出，在目前有自己具體的歷史意義。所謂思想的自由，就是說：應該廢止思想上外來的權威，思想應該從外來的權威獨立起來。一切關於思想的外來

鑄銬（物質的鑄銬）都不應存在。所謂自由的思想，就是說：應該喚起每人的自覺，每人都應當思想，都應當對於所遇見的任何事物，從事批判，每人都應當重新估價一切，都應當擺脫傳統思想的束縛（精神的鑄銬），從事發現自己的真理。

思想大解放的運動，批判的運動，同時也即是理性的運動。張申府先生在他的「五四紀念與新啓蒙運動」文中說得很對：「這個啓蒙運動必是理性運動。必然要反對衝動，裁抑感情，而發揚理性……啓蒙的本意本在開明。沒有理性，如何能有開明……」

我們是需要反省的時候，理性正需要反省。教育者自己先要受教育。一切人不但要大無畏地批判事物，同時也正需要大無畏的自己批判。所以在批判運動中，我們還應有「自己批判」的運動。每個人不掩瞞，不敷衍，不塞責，不撒謊和造謠，在中國人民的面前，公開地檢查自己。敢這樣大無畏批判事物和批判自己而有受批判的勇氣的，這就是中華民族最好的子女，這才可以成爲真正衛國殉國的戰士。比如在文化界中，在教育界中，一切人都不應當只譴責別人，而缺乏自己的反省。諷笑左方淺薄的人，應該問問自己

有沒有比左方淺薄的地方！左方有笑人落後的，也應該問問自己是否已夠克服人家的落後？最近有人在文學上提過「反差不多」，誠然，應該反對千篇一律的「差不多」，應該反對僵死的公式主義。可是，用「反差不多」來反對他方文學的，也應該問問自己的同伴中，有那些作品不是「差不多」？有那些比較「吶喊」偉大？有那些比較「女神」偉大？有那些比較「子夜」？「八月的鄉村」？「雷雨」和「日出」偉大？至如在一些科學哲學範圍中，老文化人也應該想想：數十年來，除了清末嚴復所譯的亞丹斯密「原富」，孟德斯鳩「法意」，赫胥黎「天演論」，穆勒「名學」……五四時期馬君武所譯的達爾文「物種原始」，赫克爾「一元哲學」等名著外，除了譚嗣同的「仁學」，康有爲的「大同書」，章太炎的「國故論衡」，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吳虞「文錄」這些可看的著作外，還提給了中國文化界什麼寶貴的東西？幾十年中老文化人是否會比起一些少數的青年文化人在幾年中所貢獻給中國文化的爲特多？一些老文化人對於青年文化人總是那樣老氣橫秋，不屑似的譏笑他們，然而可應該想想呀！對於青年人的求知求真，採



取那種無理的、刻薄的譏笑的態度，不正是一種獨斷的態度嗎？

我們絕不故意爲青年文化人自己辯護。我以爲我們青年文化人（如果像我這樣不學無術的人也勉強可以算在內的話）有極大的弱點。他們有求真理的熱誠，但一般說來，還嫌潦草，還嫌不夠。他們在文化上已介紹過一些世界上劃時代的著作，但還缺少自己劃時代的著作。郭鼎堂（應該算他是青年文化人的一個）的考古勞作是劃時代的，但在理論上却多欠缺。他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雖則算是空前的著作，却不能說是不朽。艾思奇對於哲學之通俗化的試作，也算是劃時代的，可是其中也還有潦草的地方，而特別與中國歷史諸現實的聯結，還是不夠。一直到現在，我們還沒有關於中國社會史的偉大著作。一直到現在，我們還沒有關於現代中國經濟的偉大著作，一直到現在，我們還沒有關於中國思想史的偉大著作。何幹之先生所寫的「差不多在社會科學界」是需要一切青年文化人的深省的。我們這裏需要不斷的自已批判。我們需要這樣的警惕：淺薄雖然不是獨斷，但淺薄却也是會有流於獨斷的危險的。

新啓蒙運動是民主主義的思想運動，是愛國主義的思想運動。說是民主主義的，就是說思想的自由與自由的思想。說是愛國主義的，就是說：這種思想的自由與自由的思想，在目前是爲着喚醒四萬萬同胞起來保衛我們垂危的祖國。有人說：新啓蒙運動是「守舊」，是「復古」，如果照這種別有肺腑的人的話說來，那就是說，我們現在不應做民主主義的思想運動，我們不應做愛國主義的思想運動。照這種別有肺腑的人看來，那末，鄭孝胥「王道」的獨斷才是「維新」，而讓祖國滅亡才是「革命」！

愛國主義在我們這裏是「反動」，是「復古」。法國大革命的人們都稱自己是一「愛國者」，難道他們是「反動」，是「復古」？難道法國大革命的人們保衛垂危的祖國，反對叛賣祖國的法奸，那算是「反動」，是「復古」？不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當中，革命者曾反對了第二國際的社會愛國主義者。但我們要問：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什麼樣的戰爭？難道雙方從事戰爭的帝國主義者在當時是因爲自己的「祖國」有滅亡的危險？難道他們的從事戰爭不是簡單地爲着重新瓜分世界？難道革命者應當擁護這樣掠奪的

戰爭現在的我們，現在的中國人，所處的情形又是怎樣的呢？是否和法國大革命的人們相似，是否處在亡國的危境呢？難道我們民族和日本帝國主義者的爭鬥，是兩個帝國主義者瓜分世界的爭鬥？難道我們民族不正是在被人豆剖瓜分？難道我們應該坐視我們祖國變成高麗，變成印度，變成整個的「滿洲」？那時我們再來高談「革命」？

我們的新啓蒙運動是要把四萬萬同胞從復古，獨斷，迷信，盲從的愚昧精神生活中喚醒起來，要使四萬萬同胞過着有文化的，有理性的，光明的，獨立的精神生活；但那種別有肺腑的人却說是「與大衆無涉」。我們的新啓蒙運動，要推動四萬萬同胞爲中華民國生存而走上戰鬥；爲自己的幸福而走上戰鬥；但那種別有肺腑的人，却說是「與大衆無涉」。法利賽文士說「啓蒙」只是「市民」的，「大衆」就用不着啓蒙。這樣，「大衆」就應該永遠愚昧。法利賽文士說「啓蒙」業已過去了，我們現在用不着「啓蒙」。這樣，我們現在應該讓鄭孝胥宣傳「王道樂土」，讓人復古，我們應該擁護迷信，武斷和盲從。我們必要說：啓蒙是大衆的，啓蒙是現實的中國並未過去。「啓蒙」固然開始於西

歐「市民層」思想家向中古獨斷的鬥爭，而這名詞在歷史上特別曾和法國十八世紀的偉大思想家的名字相聯結。但「啓蒙」這範疇並不是屬於「市民」的專有，「啓蒙」之歷史的意義是文化的民主主義。「啓蒙」這範疇，不能當成「市民層」的專有，正如不能把民主主義當成市民的專有。反之，「市民層」對於啓蒙，對於民主，却時常是很狹隘的；「市民層」却是最容易在私利的情形下，成爲啓蒙事業的變節者，成爲民主事業的變節者，雖則法國市民的啓蒙運動，曾是偉大的文化革命運動，雖則法國市民領導下的民主革命曾經是大革命。在某種歷史的情勢之下，啓蒙事業恰如在政治上一樣，却只好由另一種的歷史掌舵人來引路，來担戴。在這種新歷史的情勢之下，啓蒙運動顯然不是法國啓蒙運動之簡單的再版。這裏是最深刻的最實現的辯證法，而不是法利賽文士的詭辯。

當前的新啓蒙運動不但不是法國十八世紀啓蒙運動之簡單的再版，同樣地也不是戊戌五四啓蒙運動之簡單的再版。同樣地，我們新啓蒙運動之所謂理性運動，也不是

舊理性運動之簡單的再版，而是新的理性運動。我曾這樣寫過：「我們的新啓蒙運動是五四以來更廣闊，而又更深入的第二次新文化運動。」這裏所指的意義是很明白的，但我們這裏同時也要聲明：新啓蒙運動並不是如某些人所說，是屬於「左翼」的。不，新啓蒙運動是一切愛國文化人，一切理性主義者，一切民主主義者，一切科學家，一切平民教育者，一切開明的教育家……的共同文化運動。我們認為：一切最合理，最現實，最勇敢的愛國文化人，必將成爲新啓蒙運動的核心，但他們不是包括着全體的新啓蒙運動者。

中國是這樣偉大的民族，中國人民缺乏教育的是這樣的衆多，而傳說的獨斷和迷信是這樣的深厚，敵人和漢奸進行文化的復辟又是那末的賣力，這怎麼不急需全國文化人的大團結？這怎麼不急需全國開明教育者的大團結？

新啓蒙運動不是空口號。新啓蒙運動需要結實的工作。問題提出了，這只是第一步。更困難的是真實的具體的工作。現在我們應當舉行具體的討論，同時轉化爲具體的工作。一切文化人，首先是先進的文化人，在新啓蒙運動中，應該首先拿出自己具體的「貨

色」出來，而在工作方式上，應該進行民主的大轉變。應該由個人的研究轉變爲集體的研究。應該由亭子間中，圖書館中，科學館中的個人工作轉向文化界的大衆，轉向作坊和鄉間的大衆，應該認爲所謂文化界的大團結，這不只是一種號召，而是真的需要工作上的聯合。我們應該和一切開明的哲學家科學家聯合，普及地組織科學哲學的演講會，研究會，無神會；對於神學，獨斷，禮教，一切侵略者漢奸的邪說，進行廣泛的批判；對於世界最好的科學著作，哲學名著，一切幫助民族解放，人類解放的最好理論，分工合作地進行介紹和翻譯。應該和一切科學家聯合，去作民間的科學化運動。應該和一切平民教育者，一切小學校教員，一切開明的教育者，一切文字改革者及一切大中小學生聯合，去作民間的通俗教育運動，廢除文盲運動，各種式樣的破除迷信運動。應該轉變教育羣衆的死版方式，（比如：一些從事新文字運動者不估計民衆的目前急需及其自己的願望，就生吞活剝地要去教他們新文字，結果他們不能接受。）應該認爲「由簡體字到新文字」這個口號在廣大落後羣衆中之最現實的意義。應該和一切新文學家聯合，去消滅那荒唐，

迷信，誨淫誨盜的舊小說，舊鼓詞，把最廣大的下層社會讀者奪取過來。在文學上，在一切藝術範圍內，應該強調「人的文學」、「國民文學」、「通俗文學」、「爲人生而藝術」的口號。用這些口號把一切開明的文學家，藝術家團結起來。應該和一切考古疑古的歷史學者聯合，繼續考古疑古的工作，反對恢復舊歷史學的教條。（李季在「讀書雜誌」中國社會史論戰中，反對顧頡剛等人的「疑古」工作，在一些新歷史學的研究者中，頗發生了影響，並且有人即襲用李季的理論來寫成專書；這種無根據，無分析的籠統恢復舊歷史學的教條，在歷史學上，是開倒車，是不足爲訓的。）應該努力糾正過去文化界中互相謾罵，互相輕視，互相標榜的惡習。應該多做實事，多說實話，少誇張，少說廢話。

我們要向當局呼籲，特別要向一切教育當局，一切文化機關呼籲：請他們幫助全國文化人這個新啓蒙運動，請他們和一切啓蒙運動者合作，在各方面給這個啓蒙運動以一切必需的便利。

爲着獨立的祖國，爲着文化的祖國，全國的文化人，全國的教育者，全國的大中

小學生，以及全國的教育當局，全國的文化機關，一致聯合起來呀！

## 追 記

拙稿寄給「認識」編者後幾，天得到了「國際知識」第一期，其中有一篇「開展新文化運動」對我所批評，甚謝甚謝。那篇文章批評我「實際上容量太狹，和不會把握住活的現實的，確阻礙這一運動的開展。」所謂「容量太狹」就是因爲我這樣說過：「新哲學者乃是目前新啓蒙的主力，動的邏輯之具體的應用，將成爲目前新啓蒙運動的中心。」那位作者江凌先生把這段當成這樣解釋：「你應該跟着我走，你應該接受我的意見，我是主動者。」我想，江先生這樣解釋，實在是不應當的。因爲隨便一個普通的讀者，都不會把我的話當成這樣解釋的，只要他懂得中國文字。如果不做這樣曲解，那末，我本來那些話，也只是在說明目前新文化運動和過去新文化運動的在人事上和在認識世界的工具上之主要的變化而已。我想，如果我們

了解歷史是由人做的，而且人在不同的階段上還會做出不同的歷史，那末，關於我的那些話，倒是不大用着爭辯的。江先生還認為：在打破宗派主義的門戶，聯合全國愛國的開明的文化人，以從事抗敵、反禮教、反獨斷、反迷信的思想爭鬥中，要是像我所說的，新哲學者還要努力不倦地根據自己獨立的基本立場，站在思想界的前頭，從事于中國現實之唯物辯證法的闡釋，——這也「就不大妥當了。」這樣說來，好像在新啓蒙運動中，新哲學者是不應站在思想界的前頭，不應有獨立的任務了，新哲學者應該取消自己的哲學。你說，這樣妥當不妥當呢？我希望江先生自己想想！

我想：目前各種人之有共同的立場，並不妨礙其各自獨立的立場，而且一般人目前之共同的立場，實在還是根據于各自獨立的立場而來的。這是歷史的事實，却不必掩諱。如以為指出了這樣的事實，合作就成爲不可能，這就是對於具體歷史關係，還缺乏深切的了解。如說，因爲我說過上面那幾句話，便已阻礙了運動，這是小視天下事了。

江先生說我「不會把握住活的實現」據說這「特別」是因爲我沒有把握三中全會後中國政局的新轉向。一般說來，我前此所表現的幾篇文章，或遠在三中全會半年前，或在三中全會幾個月前，我不是傳說中的劉伯溫，當然不會預先寫下關於三中全會後的事情，這也算是沒有辦法的。至于我提出的問題，是否「緊緊地把握住」一般政治情勢，有文章爲證，我也不必多費筆墨了。

問題的討論和批判，當然是最好的。不過，我希望在這種討論中，對於對方的意見，要先盡量地考察。如對於對方的意見加以一種明顯的曲解，這樣就會引起無謂的糾紛，妨礙了正當問題的討論。

在答覆江先生之後，我在這裏要特別強調地說幾句話：第一，像我在這篇文章中所再特別闡釋的，新啓蒙運動的確是全國文化人的共同的文化運動，而不是「左翼」的文化運動。所以，我們希望從事這種新文化運動的人，必要嚴謹地提防自己的宗派。（本來江先生如來強調這點，不強曲解別人的意見，我也以爲是完全

正確的。)在我所有的文章中，關於這點，我實在採取了審慎的態度。比如，關於孔子  
的問題，我算是強調地指出了孔教的奴役作用，但還是留了與崇信孔子者合作的  
餘地。艾思奇先生在一些文章中關於「孔家店」的態度，我認為是完全正確的。五  
四時代「打倒孔家店」的口號，在目前應由反獨斷、反禮教、反復古的口號表現出來。  
第二，我們雖則在做着文化鬥爭，但民族統一運動，是絕對不受文化鬥爭限制的，民  
族統一。是容納着一切不同信仰的人們，就是說我們在文化上反對獨斷，反對迷信，  
但對於那迷信任何獨斷，迷信任何宗教的同胞，我們不但不應反對他們，而且要盡  
力避免刺激他們的宗教感情和家族感情，號召他們合作，以引進他們到民族鬥爭  
的漩渦中，使他們能夠在鬥爭中克服自己的迷信。這點是極重要的。忽視了這點，則  
將造成極大的錯誤。過去在民間做破除迷信的運動的，時常在任何情形下把破除  
迷信簡單地變成教條，時常不使民衆經過生活的教育，即大刀闊斧地拆毀寺院，以  
致惹起當地人民的反感，惹起陣容的分裂。這個教訓不可忘記了。

五月十六日

## 思想無罪

——我們爲「保衛中國最好的文化傳統」以及「爭取現代文化的中國」而奮鬥——

在專制時代的中國，在中世紀的歐洲，在希特拉的德意志和墨沙里尼的意大利，思想是犯罪的。在民主共和的中國，我們要宣佈思想無罪，在這正要喚起民衆來拯救自己祖國的中國，新思想更應當無罪，新啓蒙運動更應當無罪。

啓蒙思想不是別的，乃是救中國的思想。啓蒙思想，在我們這裏，本來不是稀奇的，也不是新奇。數十年來，我們曾經有過不少啓蒙思想家。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便是一種偉大的啓蒙思想。中山先生關於知難行易的哲學學說，同樣的是對於舊傳統思想（「知易行難」）的一種反叛。死在中華民族罪人——慈禧太后刀下的譚嗣同，曾經「流涕

哀呼強聒不舍……衝決倫常之網羅。」康有為宣傳過變法改制和「大同」的思想。梁啟超宣傳過「新民」的學說。嚴復介紹過自由和天演的學說。在五四時代，胡適反對過「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舊倫理，反對過所謂「東洋精神文化」。吳虞，這個老人，如胡適所稱的，曾經是在四川「隻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錢玄同先生也是激烈主張過「祛除三綱五倫之奴隸道德」的好漢。在現在的「黨國要人」中，還有不少在過去是這種啓蒙思想的倡導者或叫喊者（如蔡元培，吳稚暉，邵力子，張繼，李石曾……諸先生。而在現在，也還是有人繼續保留這種思想。陳公博先生最近在「民族雜誌」發表的一篇文章，這是需要一切反對啓蒙思想的人讀一遍的。北平教育界名流陶希聖先生最近也再三地說，需要「文化上的啓蒙運動」和「思想界的民主運動」。

如果我們稍為涉獵一下過去一些啓蒙思想家的著作，那末，我們就可看到他們對於一些問題的提出，有時甚至比我們現在所提出的，更為無顧忌地激烈。一般說來，我們對於許多問題的提出是很慎重的。這點主要的，就是因為我們要更「歷史地」來提出

### 問題，了解問題和解決問題。

不錯，我們和過去啓蒙思想家一樣，反對吃人的舊倫理，和舊教條。吃人的舊倫理和舊教條需要反對，這是不可以駁倒的；因為我們要做人，因為我們要使每個中國人成為頂天立地的自覺的人，因為我們要使每個中國人都能起來救中國，所以我們不能容忍人吃人的舊倫理；因為這種人吃人的舊倫理，是奴隸的倫理，是容忍敵人滅亡中國的「倫理」，也即是鄭孝胥的「倫理」。錢玄同先生在五四時代，就大胆地宣言道：「欲使中國不亡，欲使中國成為二十世紀文明之民族，」就必要反對這種舊倫理。（「新青年」第四卷第四號「中國今後之文字問題。」）然而，我們要鄭重聲明：我們並不是要推翻全部中國舊文化的傳統，我們對於舊文化的各種傳統，都採取了批判的態度；好的，我們要繼承下來，並給以發揚；不好的，我們就絕不顧惜。我們不但喜歡古代最深的哲學——如墨子的哲學。我們對於孔子，雖則厭惡其愚民的哲學（如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雖則厭惡其虛偽的哲學（如所謂「吾豈瓠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但同時我

們也認爲其舊愛國思想（如所謂「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在今日的愛國運動中，有了自己的意義。孔子門弟子如子張的所謂「士見危致命」，如曾子的所謂「士不可以弘毅，任重而道遠」，這種人類奮鬥的精神和做人應有的氣節，現在正被漢奸們所消滅，而我們却必要特別加以發揚。

我們厭惡一切的虛偽。從來以維護舊道德自命的人，正是表現了那種所謂「舊道德」的虛偽。陳公博先生對於這點會說是「二重人格，相率爲偽」。他說「自己所未能行的，而強制人以行，甚至自己不是這樣做的，而偏以此爲號召天下的工具。如果我們還拿這些胡說去宣傳和訓練民衆，無異自白無法以安天下，只有胡說以騙人民。上下交征利，固然可以使一國危亡，上下交相騙，更可以使一國廢滅。」又說：「……平日無論他口裏怎樣高談道德，標榜清高，一至危難，遇責任則躲避，遇犧牲則潛逃。那些臨難不苟和殺身成仁，往往出自引車賣漿者流，而不出於峨冠博帶之輩，因爲引車賣漿者流的天性未泯，而峨冠博帶之輩的良能早沒罷了。」要找現代的證據，那末，鄭孝胥池宗墨便是一個

最大的證據。鄭孝胥，池宗墨，便是以維護舊道德自命，而去當漢奸的。

數十年來最勇敢站在思想界最前頭，向虛偽的吃人的舊道德舊禮教宣戰的代表者，差不多都是對於民族，對於社會，對於父母兄弟，對於友誼，都表現了最崇高的德行。譚嗣同爲國家的死難，是如何的悲壯？魯迅對於民族，對於青年，供獻了自己一切的血，同時對於他的母親又是如何的盡自己的孝道？對於朋友又是如何的盡情盡義？

中國民族最覺悟的子女，他們反對吃人的禮教，反對忠於那「視天下爲其囊橐中之私產，而犬馬土芥乎天下之民」（譚嗣同）的君主，反對對於個人的愚忠，反對那種所謂「苦塊昏迷」的偽孝，反對那種盲從的愚孝，反對那種無人道地強迫婦女的愚節，反對那種奴隸要爲主人犧牲生命的愚義。但我們同時要提倡效忠民族，效忠社會，我們要提倡民族的和社會的正義和氣節。我們主張每人都應當合理地孝敬自己的父母，合理地友愛自己的兄弟，能彼此互相規勸，互相號召，而爲民族的社會的合理事業而效死。我們要把隸屬個人的道德，轉變爲民族的社會的道德。隸屬個人的道德，是奴隸的道德，而



民族的社會的道德，却是抗爭的道德。

我們認為要提倡民族解放和人類解放的道德，那就不應當束縛人們的思想，不應當用教條和獨斷來規定人們的信仰。人們應當有思想的自由與自由的思想，因而使他們都能成爲衛國殉國，爲社會正義而犧牲之真正的自覺戰士。我很同情胡適之先生這句話：「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奴才建造得起來的。」要使四萬萬同胞不成爲奴才，那末就不應宣傳奴才的教條和獨斷，不應使同胞們保留奴才的信仰。關於「名教」，譚嗣同曾寫過極痛切的話：「名之所在，不惟關其口，使不敢昌言，乃並錮其心，使不敢涉想。」譚嗣同所要衝決的這種名教，正是一種奴才的教條，而那宣傳這種名教，如鄭孝胥殷汝耕所做了的，正是要叫同胞好好當奴才。我希望一切民族的自覺之士，一切救國的豪傑，一切不願使自己和全體同胞當亡國奴的，都應當對這點有深切的了解。

當然，中國自有啓蒙思想運動以來，都同時出現過一些所謂「衛道」之士。戊戌時代，有葉德輝的「翼教叢書」，五四時代，有康有爲、林琴南、王敬軒的頑抗，這些都算是彰

明較著的。然而歷史只給了這些「衛道」的戰士以最大的嘲笑。我想：現在一些想奮身起來做這種「衛道」之士的，想做現在的葉德輝、康有爲和「荊生」的，首先應當考慮一下：歷史曾給了葉德輝、康有爲、「荊生」……以什麼的座位？歷史究竟給他們得到了什麼樣的結果？這樣，也就很可以「廢然知返」了。

據說「衛道之士」要保衛的是「國粹」。然而，我就說：他們要保衛的，只是中國文化最可笑，最庸俗，最無用甚至最野蠻的渣滓，也不是真正的「國粹」。正如我上面所說的，我們並不是要全部推翻中國文化的傳統，而且事實上，有啓蒙運動以來，一切啓蒙思想家都曾極力發揮過一些最好的文化上的「國粹」，如中山先生和康、譚的發揮「大同」思想，如章太炎的「國故論衡」和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都曾整理過一些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的精華。如錢玄同、顧頡剛、徐炳昶、郭沫若都努力發現過或在發現着中國古代文化的真面目……要說保存真正的「國粹」，那末，他們都會做過真正保存國粹的多少工作。而現在我們也正在繼續着這樣的事業。我們是爲保衛中國最好的文化